

## 第一章 凤凰的涅槃

### 战后历史社会学的再生

在 50 年前，历史社会学濒临灭绝的边缘。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它的批判性见解都十分敌视。它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早期一直疲弱不振。然而，在此之后，它就像从灰烬中飞出的凤凰一样，得到了再生。到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它已在高空展翅翱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其他一些人展示了宏伟的抱负；像西蒙·沙马（Simon Schama）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这样的作者已拥有了大量的读者。这种学术的活力与公众的关注相结合给了历史社会学一个大机遇，使它能够给公民文化打上自己的印记。历史社会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工作有可能给他们的公民同胞以知识和技能，从而或许有助于后者去评价各种关于什么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不同见解。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能够成为促进民主的公民权的积极推动力量。

就其精髓而言 历史社会学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它追寻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探求使一些

人类抱负受阻、同时又使另一些人类抱负得以实现的深层社会结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知识很值得去探究。你是在推一扇开着的门，还是在用头撞击一堵砖墙，在任何情况下，心中有数必竟还是有用的。历史社会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区分清楚开着的门与砖墙，并且探究出除去砖墙的可能性、方式及其后果。

社会延续与转型机制的研究，与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个关注点有着紧密的关系。这就是探究人们试图实现或阻碍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的活动的社会前提条件与社会后果。战后时期，T·H·马歇尔（T. H. Marshall）、E·P·汤普森（E. P. Thompson）、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等一些杰出的实践者参与了这种探索。历史社会学被用来探讨权力和价值观。

现在我们正处在历史社会学发展的第二次浪潮的顶峰。第一次浪潮始于 18 世纪中期，在英国和法国特别明显。像第二次一样，它也是被想理解当代政治事件的需求推动的，这些政治事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智力挑战。举例来说，英国王权虽然在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期间两次被它的臣民所羞辱，但却在印度和加拿大击败了绝对主义的法国。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这样写道：“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与一个相对弱小的或者至少是不专断的中央政府结合在一起，反而组成了一个比完全中央集权政体更强有力的单位。启蒙运动思索了这个课题”（1988, p. 115）。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化、美国的民主实验以及德国的国家建设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提出了同样的难题。

第一次浪潮 从孟德斯鸠和休谟、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到涂

尔干 E. Durkheim 和韦伯 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终在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撞在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的墙上而一蹶不振。这些杜撰过去又“通晓”未来的体制拒绝了历史社会学。德国的知识界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大多数有创造性的人才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美国社会在那时间成了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苛刻的庇护所。在这样一个领先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里，大企业和大科学机构是价值观与知识的主要贮藏所。他们不喜欢外国知识分子前来竞争。反犹主义也起了一定作用。<sup>[1]</sup>

历史社会学存活了下来。它曾与之搏斗过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这些问题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道德难题。举例来说 马克斯·韦伯曾关心理性的性质及公正与秩序的关系。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这些道德关怀被保存在一些诸如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和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等欧洲流浪学者的著作之中，诸如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 的芝加哥社会学家的研究中，诸如莫里斯·金斯伯格 (Morris Ginsberg) 这样遵循霍布豪斯 (L. T. Hobhouse) 传统的进化论社会学家的思考中。到 50 年代 这些问题在 T·H·马歇尔和莱因哈德·本迪克斯的著作中重新突现出来。此时，历史社会学发展的第二次浪潮已经兴起。<sup>[2]</sup>

从 1958 年到 1978 年，美国有关社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数量翻了 4 倍。在 70 年代两个前后相继的 3 年时期，《英国社会学杂志》中明显涉及到历史内容的文章从 9 篇 (1973—1975 年) 增加到 24 篇 (1976—1978 年)；《历史论坛》(History Workshop)、《社会史》(Social History) 和社会史学会 (Social History Society) 都在 1976 年创办起来。<sup>[3]</sup>到了 80 年代初期，

在主要的社会学期刊上，几乎 1/4 的文章涉及到了历史的内容。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中最大的分会之一。这正像人们所说：“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Collins, 1985, p. 107).

## 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不同社会的进程与结构的不同；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相反，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探寻过去与现在、事件与运行、行动与结构的相互渗透交融。他们力图把澄清概念、比较归纳及探索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这个学术领域里也有大量的分化。但是“不同的重要思路都是跨学科的(而且).....是独自存在的它们存在于所提出的论证中，这些论证不可避免地、甚至有时是非系统的理论论证”(Calhoun, 1987, p. 625)。事实上“适当地说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根本没有可以设想出的逻辑上的、甚或是方法论上的区别”(Giddens, 1979, p. 230)。历史学和社会学乃是“同一种智力冒险”(Braudel, 1980, p. 69)。这两门学科可以被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分析程序”(Abrams, 1982, p.

xviii).

这些主张有可能简单化地成为新的学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根据查尔斯·梯利 (Charles Tilly) 的看法 历史社会学的制度化 即“学术团体、期刊、课程和职业市场份额这些部分自我标榜的专业化”，会带来一种荒唐的结果：“这是由于首先这个‘领域’缺少学术上的统一性 而就其本性来说将永远缺乏；其次这种制度化恰好妨碍了历史思维向社会学其他部分的传播，而后者恰恰是迫切需要前者的。(1988, p. 709)。

其实，梯利所指出的这种危险在程度上远远不及 50 年代受僵死的正统观念支配所造成的危险。当时，历史社会学被结构功能主义这件紧身衣束缚住了。但是到了 60 年代 历史社会学就打破了这种束缚。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它就表现出了雄心勃勃的世界眼光用以填补冷战时期独断观念崩溃所留下的空白。本书通过有关核心学者的著作来分析这一进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将论及历史社会学业已成了一种怎样的学术领域，以及它在未来的发展前景。

本书的焦点在英国和美国，但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也必须论及。在最近几十年里，后者的成果在英语世界里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和马克·布洛克 (Marc Bloch) 领导下的年鉴史学家们“成了边缘人和异教徒” (Stoianovich, 1976, p. 14)。<sup>[4]</sup> 二战后，情况有所改善。在 1968 年学潮与 70 年代初法国高校改革之后，布洛克与费弗尔的学术继承者们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了一块牢固的阵地。他们的名声不断地跨越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sup>[5]</sup> 他们的

许多著作已译成英文，包括马克·布洛克的《封建社会》、布罗代尔(Braudel)的《地中海世界》和他的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鉴于它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这三部著作都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考察。<sup>[6]</sup>

### 战后历史社会学的三个阶段

时下历史社会学的复兴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将在后面几章中分别加以讨论。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局势”历史社会学家的基调也因时而异。第一个阶段，始于60年代中期，主要与极权主义战斗。正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须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就能解决任何人类的主要问题。“美国方式”占据了上风。在英国，自由主义体制仍保持着相当的自信。这个阶段的主要人物有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T·H·马歇尔。当然我们在讨论中还将提及尼尔·斯梅尔瑟(Neil J. Smelser)、S·N·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S·M·李普塞特(S. M. Lipset)和莱因哈德·本迪克斯。

马克·布洛克与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60年代初期就已在英语世界有了较大的名气。他们的思想促成了历史社会学的第二个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基调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问题——特别是争取学生权利、黑人权利和制止越战的反抗运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变得很流行，并且受到了尊重。历史社会学又重新揭示了统治、不平等和反抗运动。这一阶段的主要人物有巴林顿·摩尔和E·P·汤普森。当然，我们也要论及另一些人，特别是查尔斯·梯利和

西达·斯科克波 (Theda Skocpol)。这些学者的主要作品均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问世。

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抗议运动的潮流持续到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妇女运动发展得相当迟缓。60 年代早期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论道：“有组织的女性主义运动，如果整天都持续的话，那么将只能同素食主义运动和裸体主义运动一道，被视为近乎一种宗教狂热”(Banks and Banks, 1964a, p. 548)。<sup>[7]</sup>到了 60 年代后期，特别是在高等学校，阶级意识普遍觉醒。在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历史社会学感受到了这种冲击。<sup>[8]</sup>把女性主义与历史社会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 80 年代初期被广为报道的西达·斯科克波对哈佛大学在终身教职方面的性别歧视的抗议。斯科克波“一位出自 60 年代的妇女”，后来曾这样写道：“对我那代人反不公正运动的普遍敬重，使我有勇气坚持与西方最自命不凡的大学的领导人玩一场最终发现是持续多年的‘斗鸡’游戏”(1988, p. 638)。她在这件事上取得了胜利。

第三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在时间上有重叠。它开始于 70 年代中期，受到了冷战时代两极格局破碎的冲击。1974 年 佩里·安德森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重要的著作。他们对历史发展，特别是欧洲历史的宏观考察，标志着历史社会学家的抱负和自信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这个阶段，美国从越南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日本的经济霸权增加了人们的忧虑，东欧爆发革命。随着旧的政治界限的逐渐打破，新的想象资源开始发挥作用。安德森用新的角度探讨了东西欧的划分。沃勒斯坦对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布罗代尔关注历史上的欧洲、美洲、亚洲之间的商贸网络

联系。迈克尔·曼对从两河流域到大西洋范围的历史长卷进行了研究。斯科克波的研究，也像梯利一样跨越了历史社会学的两个阶段，把在历史、地理和意识形态方面明显不同的三次革命放在一个解释框架中。<sup>[9]</sup>

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在《冲突社会学》一书中着手整理“一门正在形成的强劲学科”(1975, p.ix) 该书是从400多个理论命题入手的。第二年，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他的《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1976)一书。两位作者考察了现有的成果，并用新的方式把它们加以组合，从而为他们自我浩大的工程奠定了基础。科林斯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具有明显的历史意识。吉登斯事实上也是如此。三年后，吉登斯批评了那种严格的分工：“社会学家乐于把时间上的演进留给历史学家来研究；而作为交易的另一方，一些历史学家也准备把社会体系的结构特征交给社会学家。”(Giddens, 1979, p.8)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表明历史社会学自我意识的增强（例如，Genovese and Genovese, 1976; Zeldin, 1976; Tilly and Tilly, 1980）。与此同时，对方法论上的兴趣也在增长。例如在1978年就有E·P·汤普森、阿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G·A·科恩(G. A. Cohen)和诺伯特·埃利亚斯等人的著作问世。以后又有许多人的著作问世。<sup>[10]</sup>

历史社会学在第三个阶段呈现出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特别是在美国，它在学院体制内不断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它的政治倾向越来越背离历史社会学的批判精神，尤其是与沃勒斯坦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相抵忤。到了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右翼主张成

为公共事务中的主流。历史社会学家的学术重心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辩论（如在汤普森、安德森、沃勒斯坦之间）已被使之边缘化的讨论所取代，从而退出了中心舞台。在构建宏观理论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兰德尔·柯林斯、W·G·郎西曼（W.G.Runciman）、安东尼·吉登斯、欧内斯特·盖尔纳等]。1989年底共产主义体制在东欧的全面崩溃，进一步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残存声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给西方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危机。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再也不能通过简单地指责东方专制制度来使自己合法化。在发现某个新恶魔（伊斯兰教？日本人？）之前，对我们政治、经济及文化体制的批判很难被斥之为“不忠诚”。同时人们高度地关注如何使权力变得“合乎道德”如何使资本主义民主“确实有效”。在考察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将考察到目前为止历史社会学三个阶段的情形。

在第二章我们将考察历史社会学的第一个阶段，即它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从“灰烬”中的复出。在第三章我们将追溯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起飞”过程。在第四章我们将考察最近时期历史社会学“高空翱翔”的情况。最后一章我们将对90年代的历史社会学作一番思考，主要探讨这样一些问题：作为一门知识领域的历史社会学，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先后接替阶段提出的挑战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历史社会学的受众是哪些人，它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

#### 注 释

[ 1 ] 参见 Adorno *et al.*, 1964

- 
- [ 2 ] 参见 Adorno and Horkheimer, 1979; Smith, 1988a; Banks, 1989, pp. 521—523; Collini, 1979。
- [ 3 ] Knapp, 1984, p. 51 ; Hunt, 1989, p. 1; Calhoun, 1987, p. 615; Hall, 1989; Smith, 1982c, p. 299.
- [ 4 ] 参见 Smith, 1988b。
- [ 5 ] 参见, 例如, Aymard, 1972; Kedourie, 1975; Andrews, 1978; Gurevitch, 1983; Baker, 1984; Clark, 1985。
- [ 6 ] Bloch, 1961; Braudel, 1972a; Braudel, 1972b; Braudel, 1981; Braudel, 1982; Braudel, 1984。
- [ 7 ] 参见 Banks and Banks, 1964b。
- [ 8 ] 例如 Rosaldo and Lamphere, 1974; Humphries, 1977; Kuhn and Wolpe, 1978; Tilly and Scott, 1978; Hollis, 1979; Banks, 1981; Braybon, 1981; Sargent, 1981; Wemple, 1981; Ulrich, 1983; Chamberlain, 1983; Pahl, 1984; Alexander, 1984; Charles and Duffin, 1985; Banks, 1986; Hanawalt, 1986; Davidoff and Hall, 1987; Bradley, 1989。
- [ 9 ] Anderson, 1974a; Anderson, 1974b; Wallerstein, 1974; Wallerstein, 1980; Wallerstein, 1989a; Braudel, 1981; Braudel, 1982; Braudel, 1984; Mann, 1986; Skocpol, 1979。
- [ 10 ] 例如 Le Roy Ladurie, 1979; Braudel, 1980; Burke, 1980; Tilly, 1981; McLennan, 1981; Abrams, 1982; Runciman, 1983; Skocpol, 1984; Tilly, 1984; Neale, 1985; Hirst, 1985; Lloyd, 1986; Ragin, 1987; Callinicos, 1987。

## 第二章 从灰烬中复出

### 战争与和平

战争及其后果塑造了历史社会学家的思想与事业。马克·布洛克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军官的人生经历必定对他有所裨益，使他在若干年后富有想象力地再现了一千年前欧洲的情形。当时兰斯省的主教们因外敌入侵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这样哀叹：

在你面前，上帝在发怒……这里一无所有，只有洗劫一空的城镇，夷为平地或化为火海的修道院，以及荒弃的田地……强者到处欺凌弱者；人们就像大海中的鱼群，盲目地互相残食。(Bloch, 1961, p.3)<sup>[1]</sup>

以上引文出自 1939 年初版的《封建社会》第一卷（Bloch, 1961），第二卷于 1940 年出版，当时德国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布洛克再度穿上军装，成为一名上尉。四年后，他在家乡里昂因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

布洛克的生平是受战争影响的一个极端例子。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在法国沦陷的那一年，T·H·马歇尔正在为外

交部写一篇讨论怎样与一个战败的德国打交道的文章。此前马歇尔在一战中曾作为一个平民战俘在德国的一个赛马场度过四年。在二战中，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利物浦和曼岛的拘留营生活也反映出这种体验。埃利亚斯的监禁生活虽然还要痛苦，但却比较短暂。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德国较长时期（1940—1945年）的监禁生活，促成了他的历史时段分析方法的形成。<sup>[2]</sup>根据爱德华·希尔斯的说法，二战“提高了社会学家的自信”（Shils, 1980, p. 119）。在美国，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加入陆军副官署的情报与教育处。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新近的欧洲移民，在战略决策机构的研究与分析部门工作。<sup>[3]</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俄国、土耳其、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帝国体制。它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诱发了德国革命的爆发，并且一度在英国引起了人们对于革命的恐惧。原有的权威体制在大规模的毁灭中被摧垮。这些事件使得人们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中两个悬而未决问题的论争，更趋激烈。第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现代社会中公正与秩序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公民未能得到满足的法律、政治及社会权利的主张与另一方面以政治框架的稳定来保障生命、财产与和平经济交往的需求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在思维、体验及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sup>[4]</sup>

马克斯·韦伯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直接的探讨。众所周知，他对理性的本质以及直觉的理解和阐释所担当的角色很感兴趣。同时，他还对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俾斯麦倒台之后的冲突，进行了深层的分析。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官僚体制去执行它的意志，以反对贵族体制的

干扰。然而官僚体制自身却受制于强大的议会体制中有抱负、有才智的政治领袖：“完全消极的民主化是一种彻底的、不受控制的官僚统治”(Weber, 1978, p. 1453)。<sup>[5]</sup>

如果一个国家要强大，那么就必须有像韦伯本人那样的积极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协调公正与秩序。不幸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兴起的群众运动，由于其专注于对“公正”的追求，却导致了社会崩溃或政治压迫，甚或两者共同出现。这种情况随着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而得到改观。“美国方式”被宣扬为“最好”的民主形式，并且被认为能够避免使韦伯及其同时代人深感不安的那些矛盾。据说，对于一个能够提供机会平等的公正的社会秩序，人们给予了情感上的支持和理性的认可，从而形成普遍一致的舆论。爱国主义信念和适度的个人私利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协调。人类本性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均能积极地参与一个合乎道义的、稳定的政体。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塔尔科特·帕森斯发展了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对历史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本章，我们将关注这一现象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我们考察两次世界大战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其次，我们通过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S·N·艾森斯塔德和 S·M·李普塞特的著作来研究结构功能主义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T·H·马歇尔与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帕森斯、马歇尔、本迪克斯在两方面很相近。首先，他们基本上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流行的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形态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和英国社会的主要趋势。其次，他们都坚信价值观念会对一个社会的治理产生全面的作用。不过，马歇

尔和本迪克斯比帕森斯更关注于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有关社会紧张与冲突的证据。

## 意识形态的终结？

当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Bell, 1962)时,他反映了大西洋两岸一种普遍的情绪。到了50年代,看起来法西斯主义已经被击败,共产主义也受到严厉的审视。一些社会设计者已领悟到了一种平衡的观念(参见 Hayek, 1976)。当时的舆论广泛地支持政治多元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以及中央政府和更分散的机构之间的权力分享。

然而,并不是所有同时代的人都对30和40年代的这种失败与胜利作出相同的反应。S·M·李普塞特就代表了一种模式。在他的青年时代即30年代晚期,当他在纽约城市学院的预备学校就读时,他就参加了社会党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后来在大学读书时,他成了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全国主席。然而到了1961年,他攻击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偏见<sup>[6]</sup>

另一个个人经历与学术发展大不相同的例子就是莱因哈德·本迪克斯。他出生于魏玛时代的德国,成长在希特勒的体制之下,并曾短期加入青年社会工党。1938年,作为“一个22岁的德国犹太流亡者”(Bendix, 1984, p. 1)<sup>[7]</sup>,他来到了芝加哥。以“欧洲人”的眼光,他关注着依据美国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解决了的道德与政治的两难境地。李普塞特与本迪克斯合

作完成了几项研究；<sup>[8]</sup>然而，他们的个人著作却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李普塞特认为“美国方式”是“最好的可能方式”，而本迪克斯只认为它是“可能实现的最好方式之一”。

### 美国方式：帕森斯和斯梅尔瑟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学术与道德的发展，反映他的加尔文主义的、美国中西部文化的背景以及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的人生经历。帕森斯曾在 20 年代根据一项交流项目访问过德国：

西方社会型的国家可以被称为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制，这些在当时明显地处于危机状态。俄国革命和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对还在大学就读的我来说，在思想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法西斯主义运动影响了德国的睦邻关系。《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势在爆发。最后，大萧条到来了，它的灾难遍及整个世界（1970, p.831）。

在二战期间，帕森斯很担心纳粹的宣传会影响尚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这便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帕森斯后来强调社会体系内价值观的整合作用的重要性。

帕森斯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作——或者至少应当如何运作。<sup>[9]</sup>至少在原则上，帕森斯的主要关注点——关于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社会系统内部整合的发挥以及关于价

价值观的舆论扮演的角色——是可以通过比较和历史的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方法在诸如他早期的文章“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若干社会学现象”（Parsons, 1942）中得到体现。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所以在不同国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能给人们带来自豪与光荣的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理性模式的象征体系相结合的程度不同”（p. 145）。

在《社会系统》（1951）一书中，帕森斯对特定的历史情形与历史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比如科技专家与专业管理者在美国的崛起，“和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的内战后资本主义大扩张时代的‘工商界精英集团’，未能拥有一种稳固而便捷的方式使得自身成为美国的‘统治阶级’”（p. 509）。帕森斯同时也分析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俄国共产主义成功地掌握政权的后果。所有这些案例的分析都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中负有责任的领导阶层发展的关注密切相关。

几乎没有人怀疑帕森斯“非常注意经验的多样性 并且极其熟悉许多战线上的历史性比较问题”（Robertson and Turner, 1990, p. 550）。但是，与回应澄清现代社会中知识阶层的责任这一挑战相比，比较与历史研究在帕森斯的著作中是居于第二位的。在他看来，专业人员特别是社会学家的职责，是帮助人们维持一个理性、公正与完整的社会秩序（可参见，Buxton, 1985）。

### 解释社会动力机制

按照帕森斯的观点，有必要区分以下三种不同的社会动力机制：维持特定社会系统的动力机制（如社会化和社会控

制)推进“一定系统内部的某些亚变动进程”的动力机制(如在家庭制度的范围内)促进“整个社会系统进行全面变革”的动力机制(诸如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这样的“卡理斯玛型革命运动”的兴起(1951, pp. 486, 520—521))。

在一定条件下我们有可能“超越单纯描述”而对社会系统内的变迁做出解释。举例来说,只要理解了这种系统内的相关的“结构性需求”你就有可能作出“概念化解释”。“动机运行范式”也是很有用的解释工具。帕森斯这里说的是他的一个假定:“价值取向”会变成“角色期望”与“个人行动者个性”的内在因素(pp. 484—485)。

1951年,帕森斯提出:“关于社会系统变迁进程的一般理论,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是不可能得出的”(p. 586)。他没有提出一套理论,而是提供了以下一些东西:首先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用以解释变迁的某些方面;其次是一个韦伯主义的假设:“理性化进程”是“社会系统变动中的一个普遍的导向性因素”(p. 499);第三是一项结论:变迁经常伴随着“张力”(p. 513)的出现,而后者归因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和既定期望的破灭。

在50年代后期,帕森斯在主要通过下面要论及的同尼尔·斯梅尔瑟的交往,开始更全面地思考社会的变迁。事实上到60年代中期,帕森斯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进化论分析方法。按照新的观点,社会变迁采取的是日益分殊化的形式,并导致了整合问题。分殊化的系统为了增进它们的生存能力而通过“适应性升级”来解决整合问题(Parsons, 1966, p. 22)。<sup>[10]</sup>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方面,这些见解使得帕森斯向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靠近然而在30年前帕